

A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white hair, wearing a dark jacket, looking down at a document he is holding. A bright, glowing ring of light surrounds his head, and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starry space with a bright nebula.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mage.

李鉴澄先生

百岁华诞志庆集

北京天文馆 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李鉴澄先生

百岁华诞志庆集

北京天文馆 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鉴澄先生百岁华诞志庆集/北京天文馆编 一北
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ISBN 7-5084-3258-4

I. 李... II. 北... III. 天文学一文集
IV. P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5733 号

书 名	李鉴澄先生百岁华诞志庆集
作 者	北京天文馆 编
出版 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市三里河路 6 号 100044)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s @ 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3202266 (总机)、68331835 (营销中心)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微机排版中心
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规 格	850mm×1168mm 32 开本 14.875 印张 400 千字 4 插页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1—8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百岁主编关注新一期《天文爱好者》杂志出版(2005年)



2005年1月20日北京天文馆、《天文爱好者》杂志、北京市科委的领导带来贺信与鲜花登门看望李鉴澄先生。前排右一为朱进馆长、右二为李鉴澄、右三为李元



百岁老人的一日生活(2005年3月31日) (刘合群摄)



子女为父母祝寿(1994年)



李鉴澄、杨国香伉俪(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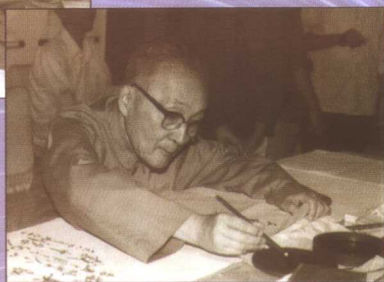
手推轮椅游北海(1995年)



父女同读书(2005年)



撰写论文(1979年)



为紫金山天文台建台50
周年题词(1984年)



与席泽宗院士合影(1980年)



在庆祝中国天文学会成立60周年
大会主席台上。右一为李鉴澄，右二
为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龚树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组织新编辑部，《天文爱好者》恢复出版(前排右二为李鉴澄先生)



调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时与同事合影留念。前排右二为李鉴澄(1957年)



长春厦门大学校友春节团聚合影，前排右三为李鉴澄(1951年)



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合影(1937年)

第一排左二为杨国香、左五为张钰哲、左九为余青松
第二排左二为刘朝阳、左七为李鉴澄、左十为李珩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流 金 岁 月

祝
賀
李
鑒
澄
老
人

百
岩
年
題

刻
比
南
山

王
大
珩
敬
賀

二
〇
〇
五
年
四
月

王大珩院士题词

敬賀澄先生百歲華誕
壽而康，德益彰

席澤宗
2004.11.09

席澤宗院士題詞

仁壽

文彙什粹 敬賀
李鑒澄先輩十秩大慶

王綬琯



序 一

今年1月20日是李鉴澄先生百岁华诞，中国邮政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天文爱好者》1月号上出了一个专辑，《科学时报》1月28日发了该报记者麻晓东的一篇长文《李鉴澄：天文界百岁第一人》，占了一整版篇幅，北京天文馆还准备出版《李鉴澄先生百岁华诞志庆集》，受到各界重视，很是隆重。在此期间，我收到了李先生亲笔题写的“同登寿域”的贺年卡，并有他的五位子女（李侗、李悦、李骥、李曙、李践行）联名写的一封信，令我兴奋不已，回忆往事，心潮澎湃，夜不能眠。

李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师与友。在我十岁（1937年）时，他就随余青松、高平子和董作宾，到河南登封告成镇对周公测景台进行调查研究，测得观星台的地理位置为东经 $113^{\circ}8'.1$ ，北纬 $34^{\circ}24'$ ，石圭（长128尺，俗称量天尺）的方位角为 0° ，确指正南北。这一结果既证明了郭守敬测量的可靠性，也证明了古代建筑上的南北方向为天文南北，而非磁南北。据《元史》记载，郭守敬测定的当地北极出地高度为“三十四度太弱”，合今 $34^{\circ}10'$ 。这一点对当前讨论的北京中轴线偏离问题很有参考价值。北京中轴线沿逆时针方向偏离 2° 多，以通过永定门桥的子午线为准，钟楼就向西偏离这条子午线300多米。以元代的测量水平，这个偏差决非测量引起，而是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我在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夔中羽教授的谈话中即已谈到此点，详细报导见今年3月1日《科学时报》头版头条的报导：《探秘北京中轴线》，3月11日和3月12日中央电

视台也作了报导。

1944年，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他在《宇宙》上发表《论周髀算经》一文，正确地指出“我国医学、天文等学科，大率以五行为枢纽，天文尤囿于星卜、占验、祥瑞灾异之说，每流于荒诞迷信，惟此书则否。其与他书判若鸿沟，尤为本书特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本文一开头引述德国《天体物理学全书》（Handbuch der Astrophysik）第六卷第三章，说：“新星之发现系属国人，实测纪录载诸典籍，斑斑可靠”。这几句话就为10年后（1954年）我做《古新星新表》的研究奠定了信心。

1947年至1951年，我在中山大学天文系念书的时候，系主任赵却民曾和我谈过，想请李先生到广州中大任教，但解放后李先生立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去了东北工作，我们未能请到。直到1957年北京天文馆开馆，应馆长陈遵妫之邀，他来担任科学顾问，我们才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毫无陌生之感。

1958年，为了完成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项目，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即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决定由叶企孙任主编，由我协助工作，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中国天文学史》，李先生是被邀请的学者之一，叶企孙对他很信任。经过酝酿协商，决定由他担任其中的“天文仪器和天文台”一章。目前这本文集中收录的有关仪器史的12篇文章，都是由这次分工演变出来的。

在“大跃进”形势的逼迫下，叶企孙主编的《中国天文学史》初稿于1959年国庆节前即已完成，但随着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幻而不断修改，到1981年才以“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名义编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然而面目已经全非。由叶企孙写的第一章“天文学的起源和先秦天文学”，由刘世楷写的第八

章“印度与阿拉伯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戴文赛写的第十一章“十年来（1949～1959年）的中国天文事业”，均弃而未用，原稿也已遗失。李先生关于“天文仪器和天文台”的这一章，虽然保存了下来，但有些观点则与李先生完全相反。例如，李先生在《晷仪——我国现存最古的天文仪器》一文中说，它“是秦汉时期人们用以测定方向的仪器”，“晷仪与日晷是两种不同用途的仪器，故名称绝不能混淆，”而1981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第181页）却说“这个仪器究竟是用来定时刻的还是定方向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却是众说纷纭，并无公认的结论”，“在我们看来，它应该是测定时刻用的”。这样，李先生的辛苦研究，就被全然抹煞，只是留了一个脚注。

虽然自己的意见被压制，李先生并不在意，他与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同仁们的关系都很好。我们相处几十年，他从来不以长者自居，做事认真负责，写文章一丝不苟，淡泊名利，平易近人，对待学术争论，心平气和，与人相处总是乐呵呵的。李先生得以健康长寿与他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很有关系，王绶琯先生的题词“仁者寿”，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李先生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不局限于仪器方面，他在90岁左右还写出了《古历十九年七闰“闰周”的由来》（1992年）、《中国古代日月交食周期的研究》（1994年）和《岁差在我国地发现、测定和冬至日所在的考证》（1997年）等高水平的关于历法方面的论文，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人钦佩。

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只占李先生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事实上他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建台的全部过程，50年代创办了《天文爱好者》杂志，主持了我国对苏联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的光学观测工作，成绩斐然。1982年3月中

国天文学会在陕西临潼召开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庆祝学会成立 60 周年。在这次大会上表彰了从事天文工作 50 年以上、对我国天文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九位老人，李先生是其中之一。20 多年来，这“九老”中其他八位均已先后去世，他们是：张钰哲（1902~1986 年）、李珩（1898~1989 年）、陈遵妫（1901~1991 年）、赵却民（1899~1982 年）、陈展云（1902~1985 年）、邹仪新（1911~1997 年）、叶述武（1911~1996 年）和龚惠人（1904~1995 年），而今健在的只有李先生一人。李先生不仅是中国天文界的第一位百岁老人，在世界天文界也属罕见，可喜可贺。我衷心祝愿他安享晚福，健康地再活 20 年，完成两个甲子周期，在人类生命史上创个最高纪录，特此祝福。

席泽宗

2005 年 3 月 5 日

序 二

2005年1月20日，一群群景仰者来到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一座普通的楼房，祝贺中国天文学界和科学技术史界老前辈李鉴澄先生的百年华诞。在一处不大的居室里，摆放着许多鲜花，李老身着得体的红色唐装，端坐在花丛中，精神矍铄，笑迎各方来客。这一天，天高气爽，阳光和煦，更增添了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

也就在这一天，我十分欣喜地得知，李老长期工作的北京天文馆的领导决定出资出版《李鉴澄先生百岁华诞志庆集》，这无疑是一个正确与及时的决定，既是送给李老的一份最佳的贺礼，也是赠予后人的一份可贵的财富。

又过了数日，我非常荣幸地先睹了这部文集的全稿。文章千古事，智慧贻来者，这是我粗读全稿后的初步体会。从中更可以领悟李老的心路历程、人生态度，以及对天文学和科学技术史的探究与贡献。

1929年，李老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大学期间曾师从著名天文学家余青松先生学习天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天文数理基础。1930年至1939年，李老作为余先生的助手，在先后建成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凤凰山天文台的创举中，从选址、设计到施工，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在随后的天文仪器安装、调试与天文观测工作的开展中，也取得颇有成效的业绩。

从1930年开始，李老在当时著名的天文学杂志《宇宙》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猎户座大星云、恒星之自转、太阳黑子周